目　　录

《边疆史地丛书》序 …… (1)

中文版序言 …… (5)

译者前言 …… (3)

前言 …… (6)

绪论 …… (1)

第一章　鲁尼文碑铭的时代 …… (16)

关于突厥的早期记载(16)。第一汗国(17)。在中华帝国控制之下 (19)。单于都护府的起事 (21)。边陲的战争(27)。于都斤山林(28)。默啜时代 (30)。汗国的危机(32)。九姓乌护(36)。最后十年(37)。

第二章　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 …… (47)

鲁尼文(47)。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及其分类(53)。鄂尔浑碑铭的修史价值 (57)。鄂尔浑文献中的中亚 (73)。

第三章　粟特人与突厥 …… (86)

粟特人 …… (86)

Alty čub sordaq(88)。袭击灵州 (86)。契丹起事 (90)。六州问题 (91)。在中国的战争 (93)。进袭陇右 (95)。阙特勤的第一次远征 (96)。六州粟特人 (99)。粟特人在朔方的侨居地(100)。通西域路线记述(104)。风路 (10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突厥……（107）
丝绸贸易（107）。突厥传说（108）。最后的匈奴（110）。阿史那部（111）。高昌的遗产（113）。汗国的粟特人（116）。朔方侨居地的兴起（120）。
阿尔瑚地区……（123）
突骑施的外族臣民（123）。七河流域诸城市（124）。粟特使臣（126）。地域联盟（133）。
第四章　东突厥汗国和中亚细亚……（154）
西征……（154）
鸣沙战役（154）。黠戛斯（155）。突骑施（157）。碑铭年代学述略（158）。大食与吐火罗（159）。康国的陷落（167）。在通往粟特的途中（170）。
康居贪漫……（173）
东突厥汗国的西部疆界（173）。石国首府。（175）。
康居人……（179）
阙特勤的路线（179）。康加尔人——斐奇内格人Кангха（181）。康居（190）。外高加索的康加尔人（194）。康居传统（196）。
本书引用参考文献……（214）
碑铭的符号……（344）
缩写语……（345）

绪　论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在科学文献中最早出现了关于鲁尼字样的碑铭的报导。这些碑铭是西伯利亚的研究者在叶尼塞河5沿岸的岩崖上发现的[1]。在最早发现这些难以猜测的符号的人中，有一名被俘虏的瑞典军官Ф.И.斯特拉伦堡（塔伯尔特）。他于1713—1722年[2]住在西伯利亚，是他称这些符号为“鲁尼体”的。这个名称虽然并不准确，却在以后成了固定的科学术语。在近二百年期间内，各种解读碑文的尝试都归于失败。1889年，西伯利亚方志学者、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雅德林采夫在北蒙古的鄂尔浑河上游发现三块石碑。其中一块只留下一些残片，上有汉文、鲁尼文以及后来考定的粟特文碑文（哈喇巴剌哈逊碑）；另外两块保存得较好，刻有鲁尼文和汉文碑文（和硕柴达木碑）[3]。1890～1891年，芬兰和俄国的考古学考察队在发现碑6铭的地方拓制并拍摄了碑文，后刊布在专门的图册上[4]。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科学院和地理学会根据拉德洛夫的创议，组织了一系列考察队去北蒙古，又在那里发现了新的鲁尼文碑铭，并对发掘物地带从考古学方面作了仔细的考察。

1891年，雅德林采夫发现了翁金碑；1897年，E.H.克列缅茨在土拉河（Тола）河岸发现了一块新的大碑，以碑文作者的名字命名为暾欲谷碑。在蒙古之后，不久又在七河流域发现了若干鲁尼文碑铭[5]。

从和硕柴达木碑铭的汉文碑文看，可以确定：这些石碑的时间

可推定为公元八世纪，是为纪念突厥默棘连可汗(这是对其名字或尊号的汉文转写，在突厥文碑文中为毗伽可汗)和其弟阙特勤(突厥文碑文为阙特勤)而树立的；从而可以进一步确定，鲁尼文碑文是以突厥语族中的一种语言写成的[6]。1893 年 12 月 15 日，在丹麦皇家科学院的会议上，汤姆森就解读鲁尼文的进展作了报告。1894 年 1 月 19 日，拉德洛夫院士已完成了阙特勤碑突厥文碑文的第一个译文[7]。从这时起，古代突厥语言的研究，被列为突厥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当年的彼得堡便成了它的中心。

1892～1903 年，彼得堡开始出版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著作，
7 总结了鄂尔浑—叶尼塞文字的研究成果[8]。参加彼得堡古代突厥碑铭研究中心工作的有俄国东方学家拉德洛夫、麦廖兰斯基、维谢洛夫斯基、巴托尔德、罗曾、札列曼、瓦西里耶夫、科尔什等人；此外还有考释鄂尔浑碑铭汉文部分的中国学者[9]、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沙畹[10]和德国汉学家夏德[11]。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赫尔辛基是研究鲁尼文的另一个中心，那里的“芬兰—乌戈尔学会”出版了芬兰赴西伯利亚和中央亚细亚的考古学考察队的材料[12]。“芬兰—乌戈尔学会”的出版物中还发表了汤姆森的突厥学著作，极为重要[13]。德国突厥学家班格和匈牙利突厥学家万伯里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对碑文作了大量的语言注释工作[14]。

1894～1896 年，拉德洛夫、汤姆森和帕克尔发表了碑铭提供的历史资料与中国历朝编年史文献的对比研究的初步成果[15]。巴托尔德对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了总的评价：“在与中国学者以往所能提供的内容相比较下，碑铭对中国编年史的译者所确定的年代学基础究竟补证了多少内容，又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新的事实或对事实作出多少新的阐述，这是必须陈述清楚的。汤姆森就年代学基础问题得出结论说、在所叙述的各种事件中，除了阙特勤(可

能还有他的父亲）之死以外，没有一个事件可以有足够的把握和中国编年史上发生在一定日期的某一特定事件等同起来。大家知道，此后不久出版的马迦特著作，曾提出一系列这类的等同对比；那个时代的某些突厥民族的特殊计算法这一新的语言学事实的确立，也是这种历史研究的成果。”[16]

巴托尔德[17]、马迦特[18]、麦廖兰斯基[19]、夏德[20]和沙畹[21]于1897～1903年发表的著作，为从修史学方面考释碑铭奠定了基础，开始了鲁尼文碑铭学研究方法上的探讨，并作出了这些碑铭是中央亚细亚和中亚细亚历史原始文献的评价。

现将这些年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列举如下：（1）确定了计算法与阙特勤和默棘连碑的年表（班格、马迦特），为考证碑铭的记载与汉文和部分阿拉伯文史料的记载是否相吻提供了可能性（马迦特、巴托尔德）；暾欲谷碑和翁金碑的年代依然不清楚，而叶尼塞碑铭的日期，连约略估计都未做到，虽然从古字学的特点来看，还可说明西伯利亚鲁尼体字似是很古的文字；（2）根据碑铭中所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对汉文史料进行了精细的研究，从而更广泛地提供了碑铭记载的各个事件的历史背景和相互联系（夏德、沙畹）；(3)从修史学角度研究碑文，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历史—政治、民族学、文化—历史和社会（最后一个方面，只有巴托尔德著作中谈到）；（4）初步对比了碑文与阿拉伯、波斯、中国、东罗马和亚美尼亚史料，从而勾画了六—七世纪突厥诸汗国的历史概貌[22]。

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中期，对鲁尼文碑铭的研究兴趣有所 9
淡薄。A.H. 萨莫伊洛维奇对新时期的特点描述如下：“麦廖兰斯基在研究突厥鲁尼体文字碑铭的三个主要成员中最年青，在研究方法的科学准确性方面，与汤姆森最接近，死亡从科学手上早早夺走了他的生命……。随着中国突厥斯坦沙漠出现大量的回鹘文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拉德洛夫放弃了对蒙古和西伯利亚碑铭的研究，他对这些碑铭（兰司铁和科特维奇较后期发现的碑铭不计在内）已作了初步的研究，并补充了难词注释和语法概述。班格写了几篇关于叶尼塞—鄂尔浑碑文的文章，揭示了这些碑铭的数词中个位数和十位数的特殊组合法。他没有停留在这些碑文上，而是对 Codex Cumanicus[23]进行详尽的研究，致力于诸突厥语言历史语法的初步研究。万伯里对突厥鲁尼文语言的研究只停留在并无重要意义的杂论上。兰司铁虽是一位突厥学家，然更以蒙古学见长。他只是短期参加了蒙古境内突厥碑铭研究者的行列，目的是使自己所发现的碑铭的原文和译文能公诸于世。"[24]

汤姆森在此后的古代突厥鲁尼文研究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从1893年至1927年，其学术兴趣一直是以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为中心。

多数研究者不再继续研究鄂尔浑—叶尼塞碑铭，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东突厥斯坦[25]发现了大量的新资料，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已有了给人以强烈影响的发现；第二，对鄂尔浑—叶尼塞碑文的初步研究分析已结束。要取得作为论据的新的资料，要求进行长期的细致耐心的工作，然而即使这样，也未必能取得重大的进展。

在汤姆森发表了《突厥学》(Turcica)（1916年）和《蒙古的古代突厥碑铭考》(1922年）两部新著后，上述看法之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这两部著作是汤姆森对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从事三十多年研究才完成的。

与此同时，发现了新的碑铭，完成刊布和翻译的有汤姆森（从东突厥斯坦发现的"鲁尼文文书"）[26]、兰司铁(苏吉碑和色楞格碑)[27]、科特维奇和萨莫伊洛维奇（阙利啜碑）[28]、马洛夫和纳默特（七河流域发现的碑铭和匈牙利的斐奇内格鲁尼文）[29]、

克谢诺方托夫、小东涅尔和雷塞南（从东西伯利亚发现的一些小碑）〔30〕。

这一时期，对碑铭从修史方面作了如下的研究：汤姆森崭新地解决了暾欲谷碑中提到的若干事件的年限问题；伯希和继续利用汉文文献的记载考释碑文〔31〕；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利用碑文解决某些历史—地理和民族学问题〔32〕；巴托尔德则广泛利用碑文材料从事文化—历史研究。

巴托尔德的贡献尤为卓著。他最后一部巨著就是驰名远近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6 年夏于伊斯坦布尔大学讲学时所作。巴托尔德在《十二讲》中总结了自己多年来在操突厥语言诸民族的历史领域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33〕。在这些年代里，巴托尔德终于象对待历史文献那样去对待这些碑铭，在其评价中反映了中亚细亚修史学状况和古代突厥鲁尼文献语文研究的深度："碑铭除了其语言学意义外，对历史学家的意义也并不小，如八世纪突厥的自述，在许多方面充实了汉文史料的记载。然而，必须记住，从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发现解读碑文的钥匙起，虽已过去了三十多年，研究工作还远未结束，许多地方的解释仍有争论。如果离开语言知识，以现有的译文为基础把碑文当作历史文献来利用，这种尝试可能得出并已经常常得出截然错误的历史结论。"〔34〕

研究鄂尔浑—叶尼塞文字的新阶段，始于 1930～1940 年，它与中央亚细亚和中亚细亚突厥语言学和修史学中的重大变化是相联系的。由于将马合木·喀什噶尔的词典和其他一些材料用于古代回鹘文献的研究，古代突厥语言研究的领域大大扩充了。在建立诸突厥语言的历史分类法和历史语法学方面作了一些初步尝试；探索这些语言和另一些与其相近的语言在物质方面和类型方面的亲属关系的兴趣浓厚了〔35〕。在这种情况下，最早的突厥碑铭对进一步发展突厥语言学的作用明显增长了。与此同时，新发

现的材料，无论对于碑铭译文的重新审核，或是对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从语文学和历史学方面所做的注释的重新核实，都或多或少提供了可能。

奥尔昆在这方面作出的初次探索，不能认为是完全令人满意的；然而，从总体研究鲁尼文碑铭的尝试性工作本身却是值得注意的[36]。继拉德洛夫几部名著之后，第一次出现了对古代突厥碑铭语言描述得相当详细的著述[37]。从事这一工作的有伯恩斯坦[38]、雷格迪隆[39]、阿兰钦[40]、谢尔巴克[41]、捷尼舍夫[42]、巴特马诺夫[43]、冯家昇[44]、克劳森[45]、阿尔托[46]、葛玛丽[47]、奥盖尔[48]、斯普伦格林[49]、布罗克曼[50]和吉罗[51]。他们发表了各种碑铭的译文和研究论述。戈齐耶夫致力于鲁尼文碑文的标点符号问题的研究[52]。马洛夫于1951～1959年发表的综述性著作，对研究古突厥文字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53]。

12

新碑铭的刊布工作和对早先已刊布的文献进行全面研究的工作一直在继续着。然而，只是到现在，才为从历史—语言学角度仔细研究古代突厥鲁尼文建立起相当坚实的基础。

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鲁尼文碑文的修史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苏联学者在中央亚细亚和中亚细亚历史的研究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他们在这些年代里所瞩目的中心问题是，从社会—经济方面描述古代突厥社会的特征[54]。从修史学角度考释鲁尼体字的其他方面则有所削弱[55]。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历史科学和资产阶级历史科学在对待碑铭上的原则分歧。资产阶级史学界人士倾向于把碑文仅仅看作是一种史料，即对于曾在中央亚细亚交替统治过的各个民族集团[56]或对于突厥所表现的、为“突厥尚武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所特有的“世界统治理想”[57]，是饶有兴味的史料。苏联研究者则已令人信服地指出：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的历史，首先是军事民主制度和原始奴隶制度转变为早期封

13

建关系制度的历史；这些过程是在同中亚和中国的定居农耕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保持密切的联系中发生的；无论在草原或是在绿洲都有过残酷的阶级斗争。

与此同时，苏联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诸突厥汗国境内民族起源过程对中亚和西伯利亚操突厥语言的现代各民族形成史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58]。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同中亚操伊兰语和突厥语居民的历史命运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在鲁尼文碑文所指出的事件中反映得尤为明显。

本书意在针对中亚细亚史研究从修史学角度考释北蒙古鲁尼文碑铭。鄂尔浑碑文保留的记载，使人们有可能按新的方式分析研究粟特人开拓七河流域和中央亚细亚的问题，描绘阿拉伯征服中亚细亚时期东突厥汗国、粟特、中国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情景，着手确定对中亚细亚、高加索和东欧古代和中世纪早期部落联盟发展史起过许多影响的民族—政治联系的倾向性。

从修史学角度考释碑铭的这些方面，和本书所研究的带史料学、年代学、历史—政治、历史—地理性质的问题是相联系的，其中还在某种程度上包括突厥部落的起源和早期史问题、第二东突厥汗国的政治史问题，各国横跨中央亚细亚的直达商路的方向问题以及其他若干问题。

第二章论述的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是本书的主要原始文献，同时也是研究的主要对象。鲁尼文碑文中的记载，在引用时与译成欧洲语言的汉文史料、阿拉伯和波斯的史地著述以及考古研究成果进行对比。研究个别问题时所引用的某些史料（例如粟特文书），以专家们对其考释所达到的水平为限。要从修史学角度评定阿拉伯文、汉文和粟特文史料在具有诸方面内容的研究课题中的价值，只有与鲁尼文碑文对比后才有可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料的范围及运用这些史料的方法，在上述巴托尔德和马伽特著作中已有大体设想。关于这些史料的组成部分和性质的详细情况，还可见于克拉奇科夫斯基、克拉奇科夫斯卡娅、皮古列夫斯卡娅、别利亚耶夫、罗马斯克维奇、科瓦列夫斯基、吉布和米诺尔斯基的专著和概论[59]。1936 年，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手稿收藏部，即在托普卡帕宫的图书馆中，又发现了一部史料——伊本·阿萨姆[60]的《征服史》（Ибн А'сам ал-Куфи，«Китаб ал-футух»）一书阿拉伯文原稿。该著因有穆罕默德·穆斯图菲·哈拉维（十二世纪）的波斯文简译本，早已闻名于世[61]。这部手稿的研究者库拉特，分析了手稿的某些部分，并由此肯定，伊本·阿萨姆是回历三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塔巴里（839～923年）、巴拉祖里（卒于 892 年）和雅忽比（卒于 897 年）的同时代人，他是在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完成其著作的[62]。

目前，《征服史》一书已刊布的材料虽然数量很少，但已表明，伊本·阿萨姆的著作是极珍贵的文献，它记载了其他作者不曾提到的重要资料。著作以相当多的篇幅阐述阿拉伯人征服中亚细亚的历史。库拉特刊布了手稿的以下各章节：《屈底波远征花剌子模记》（第 140 张上～141张上）；《屈底波降服花剌子模后去粟特远征记》（第 141张上～141张下）；《关于哈查吉（ал-хаджжадж）[63]致屈底波的一封信》（第 141 张上）；《论屈底波进犯康国（Самарканд）及其城民的战争》（第 141 张下～143 张上）；《屈底波与康国婿和并率穆斯林军队进入该地的情况》（第 143 张上～143 张下）；《向伊赫希德[64]之子乌勒迦拟出的条约》（第 143 张上～第 143 张下）[65]。后面三篇最重要，所提供的资料在其他史料中是没有的，尤其是屈底波和乌勒迦之间订约的阿拉伯文全文[66]。这后一种情况，从修史学方面来看也是极为重要的。它无可辩驳地证明，早期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他们记载的情况已为《征服史》所采

用）在叙述事件时不仅以口头相传的内容，而且也以书面文献为依据〔67〕。

另一类史料即汉文史籍，对六——八世纪中亚细亚和中央亚细亚的历史来说，其意义也未必不重要。关于突厥诸部历史的文献，二百多年来一直是许多卓越的汉学家研究的对象。本著采用了已有的各种译本〔68〕。

我们对历朝官修史的记载是很关注的，如：北周（556～581年，其史书为《周书》，完成于629年），北齐(550～577年,其史书1(为《北齐书》,完成于635年),隋(581～618年，其史书为《隋书》，完成于656年；以上列举的三部史籍以及《魏书》均收入《北史》，于656年完成)和唐(618～906年，《唐书》或《旧唐出》于945年成书；1044～1060年编撰了唐代史的新本，即《新唐书》)〔69〕。

在这些著作中有专门的章节记述异国和异族。每一个朝代的统治史，通常是在其衰落后，由上层官吏掌管的国史院这一专设机构撰写。朝代史的基本材料“是所谓的《日历》。按照在古时传统的基础上建立的法律，皇帝及其大臣对此不得过问，虽然很难说，这项法律在实际中究竟遵循到什么程度。可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能对皇帝在出朝、受觐以及其他宫廷生活等方面的言行，均有记录”〔70〕。作为异族章节的史料还有“使节的呈文和报告，文献中已有的著述，外国使节团送来的礼品清单，旅行家和商人的咨询记录等。”〔71〕

从上述情况可得出结论，汉文史籍中的记载是准确的，虽然成书的时间比起它所记叙的事件要晚得多。

与此同时，虽然朝代史保持传统的格式，但在挑选应编入史册的事实和解释个别事物时，绝不排斥编撰者的主观态度。以上列举的全部朝代编年史，在1056～1063年又经过一次校勘。

在另一类史籍中，应提一下《资治通鉴》这部编年史。它是宋

朝著名的修史学家司马光于1066～1085年所编撰的，记载了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60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还应提到的有
17 《唐会要》。它是804～961年经苏冕、杨绍复和王溥的不懈努力而编撰成的[72]。

应该指出，汉文史籍中关于东突厥的资料摘录并译成欧洲的一种语言，是在刘茂才两卷本著作问世后才得以实现的。权威学者——汉学家和突厥学家——对此已有高度评价，无需再去讨论译文的完整性和质量了[73]。刘茂才利用了关于历史、地理和宗教(佛教)方面的三十六种汉文著作、各种汉文碑铭和唐代的诗作。总之，他利用了目前所知道的自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国作者所写的有关东突厥的所有的著述，包括的时期从七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中叶。

除了摘译有关突厥的资料外，刘茂才还在《突厥与中国》这一论述精细的长篇综述中从修史学角度研究了所利用的材料，择其最感兴趣的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文中综合了突厥和中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交往的材料。刘茂才为译文所加的1885个注释，充分表现了他独特的见解，其实，许多注释并不长，但是从科学角度看却是重要的研究成果。作者批判地述评了已取得的成就，且往往由此得出了崭新的、在许多情况下是有说服力的结论。同时，在注释中也有不少有待争论的见解，在下面还要谈到[74]。

以上就是作者所使用的主要文献的简要情况。

【注　释】

〔1〕 第一次提到“鄂尔浑碑石”（上有鲁尼文碑文的石碑？）的是西伯利亚图集作者、托波尔斯克人谢苗·列麦佐夫，时间是在1696～1697年。有关古突厥碑铭的

发现和研究史详见：伯恩斯坦《鄂尔浑—叶尼塞河流域突厥社会经济结构》第11～29页；其次见马洛夫《碑文考》第11～16页（附大量文献目录），雷塞南《最古碑铭概述》第1～21页，维谢洛夫斯基《鄂尔浑碑文的发现》第59～72页。有关碑文的文献索引见：葛玛丽《古突厥语语法》第225～246页；罗文达《突厥语言和文学》第26～43页；巴托尔德《东方研究史》第270～271页；巴津《突厥学（初步总结）》第105～106页。

〔2〕 有关斯特拉伦堡的情况见：卡拉诺夫《瑞典人菲利浦—约甘·斯特拉伦堡》第170～174页。在突厥学历史上，斯特拉伦堡因发现和刊布阿布加齐的《突厥世系》一著而闻名（科诺诺夫《突厥世系。阿布加齐著》第23页），他对西伯利亚诸语言的证述，已可使他成为"阿尔泰"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见大东涅尔《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第129页）。关于叶尼塞鲁尼文的最早发现者О.У.列麦佐夫、Ф.И.斯特拉伦堡、Д.Г.梅塞施密特、Г.И.斯帕斯基的情况见：科诺诺夫《论俄国突厥学史》第207～209页；安德烈耶夫《谢苗·列麦佐夫著述》第85～126页；希德洛夫斯基《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斯帕斯基》第1238～1241页；试比较：古利宾《论"Г.И.斯帕斯基"一文》第447～448页；诺夫梁斯卡娅《Д.Г.梅塞施密特及其西伯利亚旅行日记》第231～239页。

〔3〕 雅德林采夫：《1889年鄂尔浑考察报告》第51～113页。关于雅德林采夫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见：列姆克《雅德林采夫生平简述》；罗津《各得其应得的》第323～325页。在此后的野外研究中起显著作用的是Д.А.克列缅茨和Е.Н.克列缅茨（见波波夫《Д.А.克列缅茨生平》第7～63页）。

〔4〕〔海克尔〕：《鄂尔浑碑文》；拉德洛夫：《蒙古古物图集》。

〔5〕 马松：《论中亚古代突厥鲁尼文碑文史略》第5～15页。

〔6〕 关于碑铭的汉文部分见：瓦西里耶夫《鄂尔浑碑铭的汉文碑文》第1～36页；波波夫《评新译文》第1～4页；加伯朗特兹《1号碑的汉文碑文》第ⅩⅩⅤ；ⅩⅩⅥ页；德维利亚《转写、分析与翻译》；第ⅩⅩⅥ～ⅩⅩⅧ页；施古德《阙特勤墓碑》第1～57页；夏德《关于起草者与缮写者》第151～157页；帕克尔《1号碑的汉文碑文》第212～216页；阿伦特《碑文汉文部分研究》第171～196页；伯希和《九条评注》第229～247页。

〔7〕 汤姆森：《解读》第285～299页；ATIM，1。

〔8〕 拉德洛夫：《蒙古古物图集》第1～4期，118表；《鄂尔浑考察队著作集》第1～6期；拉德洛夫《蒙古的古突厥碑铭》第1～3分册；ATIM，第1续篇；ATIM，第2续篇。

〔9〕《总理衙门书》，第1～2，8～10，15～18，27～35页。

〔10〕 沙畹：《史料》第1～378页；沙畹：《补编》第1～110页。关于沙畹的情

况见：巴托尔德与奥登堡《沙畹。悼文》，第1767～1782页。

〔11〕 夏德：《跋》第1～140页。关于夏德的情况见巴托尔德《夏德。悼文》第11～20页。

〔12〕 除以上列举的著作外另见：〔阿斯佩林、大东涅尔〕《叶尼塞碑文》；大东涅尔《字集》；兰司铁《回鹘鲁尼文铭文两件》第3～63页；海克尔《塔拉斯河流域出土的古物》。

〔13〕 汤姆森：《鄂尔浑碑铭考释》第1～224页；《突厥学》第1～107页；《一个不认识的字母》第1～9页。

〔14〕 班格在这方面的大量著作见：葛玛丽《维利·班格——凯尔》第1—12页；万伯里《古突厥碑铭注释》第1～120页。试比较麦廖兰斯基的评述（3BO，第12卷，1899，第0146～0162页）。

〔15〕 除上述著作另见：帕克尔《鞑靼千年史》。

〔16〕 巴托尔德：《汤姆森与中亚史》第11～12页。

〔17〕 巴托尔德：《历史意义》第1～36页；《史料》第1～29页；《新研究》第231～250页；《鄂尔浑碑文的计数系统》第0171～0173页。

〔18〕 马迦特：《历史词汇注释》第157～200页；《年表》。关于马迦特的情况见巴托尔德《纪念马迦特》第387～402页。

〔19〕 麦廖兰斯基：《关于鄂尔浑与叶尼塞的墓碑》第263～292页；《阙特勤碑考》第1～144页。后面这部著作是从历史——语言学角度对极重要的一块鲁尼文碑铭进行深入研究的光辉典范，至今仍不失其意义。关于麦廖兰斯基的生平和著述情况见萨莫伊洛维奇《回忆Ⅱ.M.麦廖兰斯基》第01～024页。

〔20〕 参阅注(11)。

〔21〕 参阅注(10)。

〔22〕 沙畹：《史料》第四篇。然而，巴托尔德对沙畹著作这一部分的述评却是严厉的（3BO，第15卷，1904，第0162～0185页）。

〔23〕 库曼语即波洛夫语或钦察语，该古抄本为福音书译本，于十四世纪撰成。——作者后加注

〔24〕 萨莫伊洛维奇：《威廉·汤姆森与突厥学》第24～25页。

〔25〕 即我国新疆。——译者

〔26〕 汤姆森：《文书》第296～306页；《斯坦因博士所获手稿》第181～227页；《残卷》第1082～1083页。

〔27〕 除已引用的著述外，另见兰司铁《色楞格石碑铭文的译文》第40～49页。

〔28〕 科特维奇·萨莫伊洛维奇：《突厥碑铭》第60～107页。

〔29〕 马洛夫：《古代突厥墓碑》第799～806页，《新发现的碑铭》第251～

279 页；《塔拉斯碑铭》第 17～38 页；内梅特：《兰突厥墓碑》第 134～142 页；《出土铭文》。试比较马洛夫的述评（见《东方丛书》第 10 期，1937，第 168～169 页）。

〔30〕 大东涅尔、雷塞南：《新发现的两种突厥鲁尼文碑铭》第 1～7 页；克谢诺方托夫：《解读》第 120～173 页。

〔31〕 除已引用著述另见：伯希和《默啜可汗之女》第 3～8 页；《突厥名称之起源》第 688～689 页；《评》第 113～182 页；《文字体系》第 284～289 页。

〔32〕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第 2 卷。

〔33〕 该著的土耳其文本（伊斯坦布尔，1927）并不理想。我们用的是德文本，巴托尔德亲自参加了该版本的准备工作，一直到他逝世（见巴托尔德《十二讲》；《突厥史》）。

〔34〕 巴托尔德：《现状》第 4 页。

〔35〕 巴斯卡科夫：《诸突厥语言》第 6～20 页。

〔36〕 奥尔昆：《古突厥铭文》，第 1～4 卷；试比较马洛夫述评（ЯМ，第 9 期，1940，第 186 页；ВДИ，1948，No 2，第 123～124 页）。

〔37〕 葛玛丽：《古突厥语语法》；《古突厥语中的地名》第 1～14 页；《古突厥语》第 21～45 页；纳西洛夫：《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巴特马诺夫：《叶尼塞碑铭语言》；巴特马诺夫、阿拉加奇、巴布什金：《现代与古代的叶尼塞学》；伊斯利亚莫夫：《古代突厥碑铭语言中格的用法》第 240～297 页；康德拉季耶夫：《描述碑铭语言副动词的材料》第 126～136 页；图纳：《突厥碑文中长元音表示法》第 213～282 页。

〔38〕 伯恩斯坦：《鲁尼文题词》第 303～353 页；《新发现的铭文》第 107～113 页；《勒拿河流域的古突厥文字》第 76～86 页；《粟特地区发现的古突厥文献》第 65～75 页；试比较马洛夫的述评（见 ИАН СССР，ОЛЯ，第 13 卷，1954，No 2，第 197～198 页）；《古突厥鲁尼文碑文》第 54～58 页。

〔39〕 雷格迪隆：《新发现的鲁尼文碑文》第 87～93 页；《论鲁尼文石碑上的符号》第 64～72 页；雷格迪隆、霍罗希赫：《贝加尔湖沿岸新发现的鲁尼文碑文》第 202～213 页；关于伯恩斯坦和雷格迪隆所发表的著述，参阅雷塞南的《贡献》一文第 8～6 页。

〔40〕 阿兰钦：《赛根石碑》第 76～77 页。

〔41〕 谢尔巴克：《略谈解读鲁尼文碑文的几种方法》第 269～282 页；《陶器上的符号》第 362～414 页；《新发现的石刻鲁尼文碑文》第 238～240 页。

〔42〕 捷尼舍夫：《鲁尼文铭文》第 62～66 页。

〔43〕 《吉尔吉斯碑铭新发现》第 15～21 页。

〔44〕 冯家昇：《东蒙古鲁尼文碑考》第 3～6 页；试比较维亚特基娜：《肯特地区的鲁尼文碑文》第 217～218 页。

〔45〕 克劳森：《翁金碑考》第 177～192 页；《"占卜书"考释》第 218～225 页；

《突厥语与蒙古语研究》。

〔46〕 阿尔托：《资料》第 3 ～91 页；《兰司铁与暾欲谷碑文》第 19～24 页；《鄂尔浑碑铭中马的名称》第 127～133 页。

〔47〕 葛玛丽：《古代突厥纪年法》第 191～203 页。

〔48〕 奥盖尔：《希乃乌苏碑的意义》第 361～378 页。

〔49〕 斯普伦格林：《暾欲谷的墓志铭》第 1 ～19、365～383 页。

〔50〕 布罗克曼：《古突厥碑铭》第 137～142 页。

〔51〕 吉罗：《巴音朝克图碑铭》。

〔52〕 戈齐耶夫：《关于古代突厥鲁尼体文字的符号》第 49～57 页。

〔53〕 马洛夫：《碑铭考》；《叶尼塞碑文》；《蒙古与吉尔吉斯碑铭考》。

〔54〕 布克什潘：《论古代突厥立国史》第 57～71 页；科齐明：《论突厥——蒙古封建制问题》，伯恩斯坦：《鄂尔浑—叶尼塞河流域突厥社会经济结构》。伯恩斯坦在该著中综述了自己在三十年代发表的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许多研究成果（见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这部专著也概括了作者在三十—四十年代发表的部分著作的成果（见托尔斯托夫《封建制的发生》；《论古突厥社会术语学历史》第72～78 页；《阿勃鲁伊的暴政》第 3 ～53 页；《古代花剌子模》；《沿着古代花剌子模文明的踪迹》；波塔波夫：《阿尔泰人历史概论》；奥克拉德尼科夫：《合并于俄罗斯国之前的雅库特》）。

〔55〕 克柳金：《关于达头和铁勒部的新材料》第 91～98 页；符拉基米尔佐夫：《鄂尔浑碑文中的地名》第 169～174 页；符拉基米尔佐夫：《读古突厥文献的札记》第 289～296 页；符拉基米尔佐夫：《古代突厥于都斤考》第 133～136 页；波塔波夫：《新资料》第 106～117 页。

〔56〕 查普利兹卡：《中亚突厥》；高第：《通史》第 1 卷，第 344～436 页；罗斯：《论游牧民族的迁徙》第 16～26 页；格鲁塞：《草原帝国》第 124～180 页；赛诺尔：《历史作用》第 434～437 页。

〔57〕 图兰：《关于世界统治的观念》第 77 页。

〔58〕 雅库博夫斯基：《论族源问题》；伯恩斯坦：《几个主要阶段》第 337～384 页；加富罗夫：《塔吉克简史》第 103～124 页；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第 437～638 页。

〔59〕 克拉奇科夫斯基、克拉奇科夫斯卡娅：《最古的阿拉伯文献》第 52～90 页；克拉奇科夫斯基：《阿拉伯地理文献》第 91～350 页；别利亚耶夫：《阿拉伯史料》第 12～40 页；罗马斯克维奇：《波斯文史料》第 40～61 页；皮古列夫斯卡娅：《东罗马与伊朗》第 7～48、49～52 页。皮古列夫斯卡娅的另一部著作（《叙利亚文史料》）中也有关于希腊文与叙利亚文史料的记载，这些史料我们将在下面引用（见科

瓦列夫斯基《阿赫默德·伊本·法德兰行纪》，科瓦列夫斯基：《阿布·哈桑·阿里·马苏第》第167～182页；吉布：《阿拉伯的征服》；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米诺尔斯基：《马尔瓦齐书》）。

〔60〕 伊朗九世纪作者。——译者

〔61〕 托干：《伊本·法德兰行纪》第295～309页；托干：《可萨王国诸族》第47～48页；马塞：《伊本·阿萨姆编年史》第85～90页；库拉特：《阿布·穆罕默德·宾·阿萨姆》第255～282页；库拉特：《屈底波》，第255～282页。邓洛普：《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的历史》第58、77～78、180页。关于《征服史》的波斯文译本，参阅斯托里《波斯文学》第207～208页。伊本·阿萨姆著作中包括回历纪元11～35年（公元632～656年）的那部分阿拉伯原文，见诸于世的时间较早（见佩尔奇《阿拉伯文手稿》第3卷第219～220页；布洛克曼《文学史》第1卷第150页）。

〔62〕 库拉特：《阿布·穆罕默德·宾·阿萨姆》第255～256页。

〔63〕 八世纪初呼罗珊大食总督。——译者

〔64〕 ИХШИД，表示“王”。——译者

〔65〕 库拉特：《屈底波》，第419～420页。

〔66〕 库拉特：《屈底波》，第406～408页。斯米尔诺娃：《论撒马尔罕条约史》第69～79页（在这之前不久，发表了波斯文本的条约摘要，刊于巴尔阿米的《塔巴里编年史》）；斯米尔诺娃：《阿拉伯征服史略》第119～134页。

〔67〕 吉布：《阿拉伯文献》第132页；罗森塔尔：《穆斯林史学史》第105～113页。

〔68〕 除已引用的沙畹、夏德与伯希和的著作外尚有，比丘林：《资料汇编》第1～3卷；裘涅尔：《汉文史料集》；儒连：《史料》第3卷第325～367页，第4卷第200～242、391～430、453～477页；爱伯华：《文化与居住地》；韦格尔：《历史文献》；刘茂才，第1～2卷。蒙J.H.缅希科文和K.B.瓦西里耶夫诚挚的帮助，使我有可能利用中国某些中亚史研究者的著作。

〔69〕 关于这些著作的情况见裘涅尔：《比丘林对汉文史料的研究》第Ⅳ～ⅩⅩⅥ页；裘涅尔：《汉文与满文文献目录》第183～218页；刘茂才，第1卷第473～484页；关于《新唐书》撰写情况见：罗图鲁：《选举志》，第58～63页。

〔70〕 弗卢格：《中国书籍印刷史》第223页。

〔71〕 同上。

〔72〕 关于这些情况详见弗卢格：《中国书籍印刷史》第232～236页；祖耶夫：《马印》，第93～97页；罗图鲁：《选举志》，第74～76,92页。

〔73〕 蒲立本：《评刘茂才》第381～383页；葛玛丽：（ZDMG,第109卷，1959,第2期，第460～463页）。

〔74〕 克利亚什托尔内：《中国史料》第155～156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